

翻译学

——一门新兴科学的创立

彭卓吾 著

FAN YI XUE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翻 译 学

——一门新兴科学的创立

彭卓吾 著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学:一门新兴科学的创立/彭卓吾著. —北京:
北图出版社, 2000.2
ISBN 7-5013-1692-9

I. 翻… II. 彭… III. 翻译理论 IV. 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0927 号

书名 翻译学
——一门新兴科学的创立
著者 彭卓吾

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原书目文献出版社)
发行 (100034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固安县印刷厂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7.625
字数 180(千字)
版次 2000年1月第1版 200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书号 ISBN 7-5013-1692-9/H·27
定价 12.50 元

目 录

上篇——绪论

建立翻译理论体系与翻译学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可能性和必然性

- 一 中外翻译理论严重滞后的历史与现状…………… 1
- 二 建立翻译理论体系与翻译学是大势所趋、形势所迫、人心所向、众望所归…………… 6
- 三 在建立翻译理论体系与翻译学的道路上克服障碍，走出误区，踏上正途 …………… 13

中篇——正论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科学的翻译理论体系和翻译学

- 一 实用翻译学 …………… 34
 - (甲) 理解阶段 …………… 37
 - 第一，从原文的文字入手理解原文 …………… 37
 - 第二，从逻辑方面理解原文 …………… 42
 - 第三，从掌握事实方面理解原文 …………… 43
 - 第四，从弄懂理论方面理解原文 …………… 45

(乙) 表达阶段	49
(一) 传统观点与方法	51
第一, 在改变原文句子结构方面的种种情况	51
第二, 在改变原文表达方式方面的种种情况	58
第三, 在对待原文形象性表达方面的种种 情况	61
第四, 关于增字、减字、拆句、合句问题	68
(二) 对传统观点与方法的补充与发展	77
第一, 翻译方法——直译和意译相结合	77
第二, 对单词、词组等的灵活处理——一切 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	83
(丙) 对实用翻译学的评述	89
第一, 关于翻译方法问题	89
第二, 翻译的实践性	93
第三,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95
二 理论翻译学	96
(一) 建立理论翻译学的必要性	96
(二) 理论翻译学的内容	99
1. 翻译的定义	99
2. 翻译的程序	100
3. 翻译的三原则	101
4. 翻译的规律	103
5. 翻译的标准	104
6. 翻译的方法	105
7. 翻译的功能	108
8. 翻译的指导方针	109
(三) 对翻译理论体系的检验	112
(四) 建立翻译理论体系的重大意义	114

三	基础翻译学	121
(一)	主体因素在翻译研究中不可忽视	121
(二)	基础翻译学的内容	124
1.	译者的知识结构	124
2.	译者严肃勤奋的态度	142
3.	译者的思维机制	157

下篇——总论

对翻译学的评述

一	实用翻译学、理论翻译学和基础翻译学三者之间的关系	184
二	翻译学建立过程中顿悟阶段的完成	186
三	翻译学的条件和要求	189
四	翻译学的系统整体观和系统综合观	190
五	翻译学的两个特征	192
六	翻译学的本质特征和内在属性	193
七	翻译学的真正综合性	193
八	翻译学已完全建立	195
九	一门真正翻译学的建立	196
十	翻译学是一门科学（根据科学的各种定义对翻译学加以考查）	196
十一	关于翻译学的三个一般性认识问题	204
1.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提法不妥	204
2.	翻译学应建立在什么理论之上	205
3.	关于翻译学的归属问题（即定性与定位问题）	
	存疑并向全国的行家们质疑	207

后记——余论

一	一篇文章给予本书作者的启迪、警醒、回顾与反思	210
二	哲学与科学	215
三	关于在建立翻译理论体系与翻译学方面的争鸣问题	218
四	关于翻译理论体系、狭义翻译学、广义翻译学三者 之间的正确关系	220
五	科学的功用	221
六	关于达到翻译要求的可能性、困难性与翻译的重要 性简述（从歌德关于翻译的一句名言谈起）	222
七	我写本书的动力何在？	225
八	对广大读者的期望	232

上篇——绪论

建立翻译理论体系与翻译学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可能性和必然性

一 中外翻译理论严重滞后的历史与现状

在人类历史上，自从操各种不同语言的不同集团相互交往之日起，人类的翻译活动就开始了。自然，这时的翻译活动还只限于口头翻译，即所谓口译。随着人类历史和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操各种不同语言的集团和国家开始有了自己的文字，于是它们相互之间的交往，就不仅需要口头翻译，而且还需要文字翻译，也就是说，这时的翻译活动便由口头翻译发展到了文字翻译，即所谓笔译。我国的文字翻译，据可靠的史料记载，始于春秋时期的《越人歌》，迄今已有 2500 年左右的悠久历史了。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我国的文字翻译，就其规模之大和译事之盛来说，先后经历了 4 个时期：（1）东汉至隋唐时期的佛经翻译；（2）明清时期的科技翻译；（3）“五四”运动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社科翻译；（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到目前为止所蓬勃开展的全面性的翻译。在这 4 个大的翻译时期中，我国广大的翻译

工作者翻译了大量的佛经典籍和无数的文学、政治、科技等方面的作品，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翻译实践经验，涌现出了大批的优秀翻译家。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却没有产生与此相适应的翻译理论。诚然，在古代佛经翻译方面，我国一些卓越的翻译家，如支谦、道安、鸠摩罗什、慧远、彦琮和玄奘等曾经对翻译问题发表过一些精辟的见解。然而他们发表的那些真知灼见，既是十分有限的，也是十分零散的，远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到了清末，1898年时，翻译家严复，一方面根据自己丰富的翻译实践，另一方面借鉴了古代佛经翻译家们的理论见解，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理论。这一理论的提出，把我国的翻译理论提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从严复提出这一理论到目前为止已长达一百年之久。在这百年之久的岁月里，我国的广大翻译工作者，无论就其译出作品的数量之大来说，或者就其积累的翻译经验之丰富来说，抑或就其涌现出的优秀翻译家之众多来说，无疑都超过了严复以前时期的好多倍。然而相形之下，我们在翻译理论方面却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诚然在这百年来的岁月里，曾经产生了鲁迅的“翻译必须兼顾两面说”、傅雷的“神似说”和钱钟书的“化境说”。这三种翻译观点的提出虽然曾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备受不少译者的推崇与赞扬，然而就其对翻译实践的指导与对翻译事业所起的作用来说，还远远赶不上严复的“信达雅”说，也就是说这三者之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取严复的“信达雅”说而代之。至于其他各种各样的提法就显得更为逊色了。

早在1986年，我国翻译协会会长姜椿芳同志在中国译协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曾指出：“在探讨翻译理论方面，我们既要认真汲取国外各个学派的精华，更要创立自己的学说。我国翻译界的先驱和前辈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我们要继承，也要在其基础上前进和发展。过去提过译事三难‘信、达、雅’，但时代的进展要求我们创立适应我国现实，有鲜明特

色的现代翻译理论体系。”^① 不言而喻，如果我们能够创立起这样的现代翻译理论体系，我们会在翻译理论方面获得突破性的进展，把严复所达到的翻译理论水平推向前进，从而使翻译事业能够更好地为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然而可惜这样的现代翻译理论体系迄今尚未创立。

1987年，王佐良在《新时期的翻译观》一文中指出：“严复的历史功绩不可没。‘信、达、雅’是很好的经验总结，说法精练之至，所以持久地吸引人。但时至今日，仍然津津于这三字，则只能说明我们后人的停顿不前。”^②

1991年，沈苏儒将姜椿芳会长的上述那段话概括为“继承”、“融合”、“创立”、“发展”八个字，并以此为标题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有如下几句话发人深思，他说：“严复早已作古，也从来没有一种超学术的权力把‘信达雅’说封为‘圣经’。这只是因为翻译工作者感到在工作中需要它，并且感到迄今还没有另外一种学说可以取代它。不是‘信达雅’三字挡住了翻译理论的发展，而是翻译研究工作的薄弱使我们至今还没有创立起一种超越‘信达雅’说的、具有现代科学特征的翻译理论。”^③ 这个评价是中肯的，符合事实的。这篇文章发表至今，已过去了8个年头。在这8年期间，我国翻译理论界的确呈现出一片勃勃生机，无论就踊跃介绍外国译论而言，或者就我国译论者所发表的专著、文集和文章而言，都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然而，无可讳言，尽管如此，我国迄今仍未创立起具有鲜明特色的现代翻译理论体系。也就是说，我国的翻译理论至今还停留在一百年以前严复所达到的那个水平上，还没有突破严复在一百年前所达到

① 《中国翻译》1986年第4期第11页。

② 同上，1987年第5期第2页。

③ 《外国语》1991年第5期第4页。

的那个理论高度。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而这一事实则充分说明了我国的翻译理论处于一种多么严重的滞后状态！

我国的情况如此，那么，西方各国在翻译理论方面的情况又如何呢？在这方面国际翻译工作者联合会前秘书长R.阿埃瑟朗教授为我们勾勒了一幅简图。他于1995年10月18日同我国许钧教授交谈时，后者向他提出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像法国、德国这些国家，在哲学、美学、文化等领域，长于思辨，纯理论著作不断翻新，特别在文学理论研究领域，一会儿就可构建出一个理论、一个学派、一个体系，为何唯独在翻译理论研究方面，至今还没有出现过一本系统完整的‘翻译学’开山之作？”R.阿埃瑟朗回答说：“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现象。翻译是人类的一项古老而复杂的活动。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今年9月30日，是第五个‘国际翻译日’，对翻译在世界文化、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人们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对翻译的研究却相当滞后，翻译中的许多理论问题，还期待人们去探索。应该说，自从人类有了翻译这种活动之后，人们就一刻也没有放弃对翻译的探索。从西方翻译史来看，从罗马帝国时期的西塞罗到本世纪近三十年来涌现的一大批翻译理论家，如美国的奈达、法国的乔治·穆南、英国的卡特福德，一直都在进行积极努力的探索。可是为什么至今还没有出现一部系统而科学的‘翻译学’奠基之作呢？”接着他指出了两个原因：一是由于翻译活动的复杂性，二是由于“翻译是一门实践活动，不同时期，不同历史阶段的人们对翻译的目的、功用的要求不同，在理论上对翻译的实质、原则与标准就比较难以界定。”^①谭载喜在《中西现代翻译学概评》一文中的一段话可以说是对R.阿埃瑟朗的上述论述作了充实与补充，他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起，一

① 《中国翻译》1996年第1期第3页。

直到 90 年代的今天，受蓬勃发展的语言学研究的牵动，西方的翻译研究也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形形色色的翻译模式不断提出，各种各样的翻译理论相继问世。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西方各国出版的翻译研究专著和文集已不下千种。在各国翻译理论家中，较有代表性的除奈达外，还有英语世界的雅可布逊、卡特福德和斯坦纳，法语世界的穆南，德语世界的威尔斯，以及捷克语世界的列维。但所有这些翻译理论家所提出和阐述的理论，都只是较为集中、系统地反映了某一个或某几个方面的研究成果，而没能真正地、系统地阐述作为独立学科的翻译学。”^① 早在 1987 年，谭载喜在《必须建立翻译学》一文中就曾指出：“西方至今并没有一套十分完整的科学的翻译理论，也没有一部系统阐述译学研究的权威性著作，所提出的理论中……都只从某个侧面说明了翻译的某些问题，而没能从更高的层次上说明更多的问题。”^② 7 年之后，在他于 1995 年撰写上述那篇《概评》时，西方在翻译理论研究方面和翻译学的建立方面，依然如故，并未取得任何突破性的进展，而且他在这篇《概评》的最后还指出：“我们在翻译学的研究工作中，应……避免西方译学研究中那种为理论而理论，为标新立异而堆积名词术语的弊端。”——以上就是我们对中外翻译理论严重滞后的历史与现状所作的一个概述。

① 《外国语》1995 年第 3 期第 12 页。

② 《中国当代翻译百论》第 10 页。

二 建立翻译理论体系与翻译学 是大势所趋、形势所迫、人 心所向、众望所归

从上一章的概述中可以看出，无论是我国还是西方各国，在科学的翻译理论体系和翻译学的研究与建立方面，都处于严重滞后状态。尽管近几十年来西方各国的翻译理论家们发表了上千种之多的翻译理论专著和文集，我国近 20 年来许多译论研究者也发表了不少翻译理论专著和文章，然而科学的翻译理论体系和翻译学迄今并未真正建立起来。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但是事情的另一个方面则是：建立科学的翻译理论体系和翻译学，不仅确有其迫切性和必要性，而且又确有其可能性和必然性。

这里首先让我们来引证一下谭载喜在《翻译学必须重视中西译论比较研究》一文开头的两句话：“近三十年，翻译研究在世界各国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进入八十年代后，更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因此英国现代译学家巴思内特与勒费维尔评论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一项成果，是翻译学得以发展为独立学科。’”（“得以”二字下面的着重号是笔者加的）^① 笔者认为，作者这两句话中的第一句话完全正确，而第二句话则站不住脚。巴思内特和勒费维尔这两位现代译学家认为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一项成果是翻译学得以发展为一门独立学科。所谓“得以”也就是“已经”。请问：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在世界范围内，有谁写出了一部既建立了一整套科学的翻译理论体系又构建了一整套具有完善结构框架的堪称为翻译学的开山之作吗？众所周知，迄今在世界范围内并没有产生这样一部著作。而只有具有科学的翻译理

^① 《中国翻译》1998 年第 2 期第 12 页。

论体系和合理的结构框架的翻译学才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既然迄今为止还没有有这样一部翻译学的开山之作问世，怎么能够说翻译学已经（得以）发展为一门独立学科了呢？如果说翻译学真的已经建立，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那么我国和世界各国广大的翻译理论研究者也就不必在这方面苦苦探索了。实际情况恰好相反。诚然，西方的威尔斯写了一本专著，名之为《翻译学：问题与方法》（1982），我国的黄龙也写了一本名之为《翻译学》的专著（1988），然而诚如吴义诚指出的，“上面提到都将其专著冠之以《翻译学》的两位学者，作为译学研究领域的开拓者理应受到尊重，但我们还不能断言他们的专著已经具备了一门学科所应有的知识体系。”^①坦率地说，这两本专著是名不副实的。最近我国黄振定也出版了一部以《翻译学》为书名的专著（1998），但其内容则主要是谈论艺术论与科学论的统一问题。我们认为以此为内容的所谓“翻译学”，也是名实不符的，并未具有翻译学作为一门科学所应具有的内容，因而也未能解决翻译学的建立问题。而对中外翻译理论现状的正确估价应该是：无论在建立翻译理论体系方面，或者在建立翻译学方面，我国和西方各国的翻译理论界都还处在探索之中，所以许钧教授同 R. 阿埃瑟朗教授在交谈中一致认为目前翻译学是一门正在探索中的科学，这不仅是这两位交谈者的共识，也是我国广大翻译理论研究者的共识。应当指出的是，在这个为建立科学的翻译理论体系和翻译学而进行的探索方面，我国广大的译论工作者表现出了多么高昂的热情、多么殷切的企盼并付出了多么艰辛的努力啊！

下面笔者从我国近几年来一些杂志上发表的有关文章中摘录一些段落，从中可以看出建立系统的翻译理论（注：笔者认为“系统的翻译理论”和“翻译理论体系”这两种提法在概念上是

① 《外国语》1997 年第 5 期第 70 页。

完全相同的，仅仅在表述和措辞上有所不同而已）和科学的翻译学，既有其迫切性和必要性，也有其可能性和必然性。

这里首先让我们引证一下上文曾经提到的沈苏儒早在 1991 年时在《继承·融合·创立·发展》一文的最后一段中所说的几句话，他说：“翻译理论建设是一个宏大的课题，非我学力所逮。我所以要为之呐喊，是因为在我四十年对外新闻工作的经历中，痛感‘新闻无学论’、‘翻译无学论’的危害。因为‘无学’，评论无标准，培养无方向，工作无突破。因为‘无学’，大家永远在走‘盘陀路’，永远处于摸索的状态，错误重复犯，经验无人理。这种情况实在不应该长此下去了。为了祖国四化伟业，也为了我们翻译界自身的发展，把翻译理论建设提上日程并切实开展起来，已是刻不容缓的事情了。”^① 这是一个老翻译工作者发自内心的呼声。这既是他个人的迫切要求和希望，也充分反映了翻译实践对翻译理论的要求，而且言词是那样的恳切感人，充分说明了翻译理论建设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6 年之后董史良在《对当前翻译研究的思考》一文中指出：“近一二十年，广大译论工作者为建立翻译学大声疾呼、呐喊，作了不懈的努力，进行了大规模、有益的探索。译界众多学者对建立翻译学寄以厚望，不少学者也为之付诸艰辛。此类专著、专论大量涌现，蔚为大观。”^② 那么在这方面究竟涌现出了多少专著、专论呢？许钧和王克非在《近年国内立项的翻译研究课题评述》一文中指出：“八十年代以来，我国的翻译研究得到长足的发展，成果不断涌现。据我们掌握的资料估算，有关翻译的论著、教材在 100 种左右，论文在 6000 篇以上（各种翻译方面的研讨会论文情况不易统计）。这种局面的出现，一是由于近二十

① 《外国语》1991 年第 5 期。

② 《中国翻译》1997 年第 6 期第 2 页。

年实际翻译迅速增长的需要，一是由于外语界、翻译界研究热情的高涨和国外各学派、理论的促进。”^①

林璋在《1997年中国翻译学研究综述》一文中指出：“对于我国的翻译学界，1997年可以说是‘思考’的一年。在理论研究的各个主要方面，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为冲破旧理论模式多方寻找出路的努力。翻译学也因此增加了新的视角和课题。翻译学问题不仅受到外语界的重视，而且日益受到读书界的关注。”^②

吕俊和兰阳在《从学科学的角度谈翻译学的建立》一文中指出：“建立翻译学应是一个势在必行的问题，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但是任何一门新学科的建立都不是偶然的。根据学科学的理论，它的出现需要三个必备条件，即（1）一定的历史条件，（2）一定的理论准备，（3）要有一批思想敏锐、勇于创新的学术和学科带头人的队伍。从历史条件来看，建立翻译学应该说是比较成熟了。首先，翻译活动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有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的活动。在上千年的翻译实践活动中，人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有成功的探索，也有失败的教训，这对任何一个学科来说都是十分宝贵的和不可缺少的，因为它是实践的基础。其次，当前国际交往的迫切需要也从客观上对翻译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翻译形式多样化，现代科技进入翻译操作等等，使得人们要对翻译研究的原有模式作出新的调整，研究领域必须扩大，人们普遍认识到建立翻译学的迫切性与必要性。第三，相邻学科的发展也起了推动促进翻译学建立的重要作用。……第四，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协同学等横向方法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把人们的着眼点从单向研究转向系统综合的研究，把封闭式的研究变成开放式的研究，这对我们建立翻译学打下了思想

① 《外语教学与研究》1997年第1期第39页。

② 《中国翻译》1998年第3期第42页。

方法的基础。第五，学科结构科学的发展又增强了研究人员的学科的意识，学科建立中有了理论指导与依据。可以说，翻译学的建立已具备了比较充分的历史条件。

“从理论准备来看，翻译理论的研究已历时久远。从西方以修辞学为指导的文艺学观点到近代语言学指导的研究，从交际理论的出现到社会符号学的介入，已经经过了几个阶段，在每一个阶段中都有一批理论家留下了宝贵的理论财富。尽管它们都够不上称为‘翻译学’，但的确为翻译学大厦的建立奠定了基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有些系统方面已有了相当规模。在我国，从案本到求信，又从神似到化境，也走出了一条艰难的道路。尤其是近年来我国翻译理论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已把我们原来比较落后的翻译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使得我们可以和西方研究相同步。这些成就与成果如果放在翻译学的框架中去，那么翻译学就如一台机器一样，很快就会装配起来。

“在学科带头人方面，可以说队伍已形成并正在壮大。已有一批勇于开拓、锐意创新的译界代表人物出现，如罗新璋、刘宓庆、杨自俭、谭载喜等人，他们悉心研究，精心构筑，奋力拼搏，为翻译学的建立贡献自己的才华，提出明确的口号，他们振臂一呼，许多中青年学者积极响应，很快一支队伍就在翻译学的旗帜下聚集起来。”^①——我们引证的这一长段话表明，建立翻译学这门新学科所需要的三个必备条件都已经具备，翻译学很快就可以建立起来了。这一长段话充分表明了建立翻译学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许钧在《关于翻译理论研究的几点看法》一文中对我国近15年来在翻译理论研究方面的成败得失作了全面的评价。一方面，他指出：“在近十几年的翻译理论探索中，我们确实走过一

① 《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第56—57页。